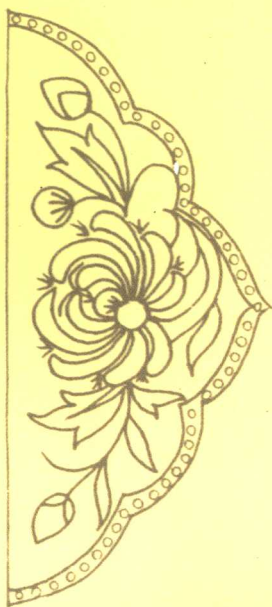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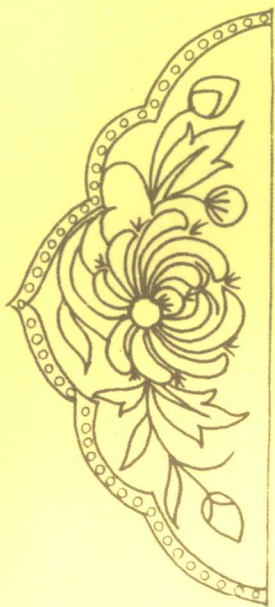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实用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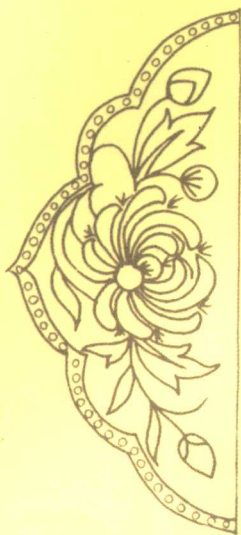
周成平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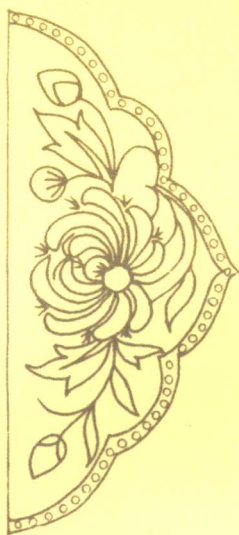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
语文教学新论
美学教程



中国当代文学实用教程

外国文学实用教程
中国现代文学实用教程
中国古代文学实用教程



责任编辑 盛晓霞 徐 蕾
封面设计 书衣坊

ISBN 7-81101-449-1



9 787811 014495 >

ISBN 7-81101-449-1/I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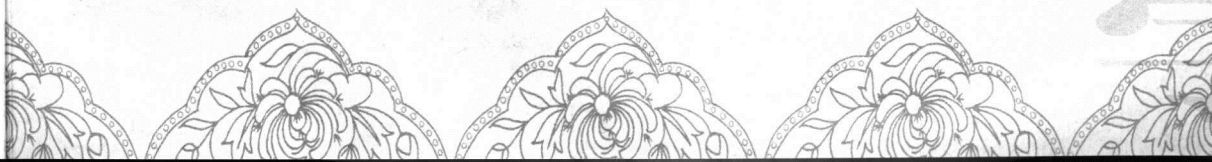
定价: 32.00元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 实用教程

周成平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实用教程 / 周成平编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5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ISBN 7-81101-449-1/I·24

I. 中... II. 周...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 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106 号

-
- 书 名** 中国当代文学实用教程
作 者 周成平
责任编辑 盛晓霞 徐蕾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66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600 册
书 号 ISBN 7—81101—449—1/I·24
定 价 32.00 元
- 出 版 人** 闻玉银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引 言	/1
第一章 十七年的文学运动	/13
第二章 十七年的小说	第一节 十七年小说创作发展概述/39 第二节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44 第三节 王蒙等人的探索性小说/50 第四节 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56 第五节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64
第三章 十七年的诗歌	第一节 十七年诗歌创作发展概述/75 第二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创作/78 第三节 闻捷、李瑛等与“新边塞诗”/83 第四节 郭沫若等老一辈诗人的诗歌创作/90
第四章 十七年的散文	第一节 十七年散文创作发展概述/95 第二节 刘白羽与激情派散文/99 第三节 杨朔与诗画派散文/105 第四节 秦牧与新小品派散文/111
第五章 十七年的戏剧	第一节 十七年戏剧创作发展概述/117 第二节 建国后老舍的剧作道路/121 第三节 “第四种剧本”/124 第四节 多种题材的其他剧作/128



第六章 文革时期文学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大倒退/134
	第二节 呈现复杂局面的文革后期文学/137
第七章 新时期文学的 发展道路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144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152
	第三节 新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56
第八章 新时期的小说	第一节 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概述/161
	第二节 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167
	第三节 王蒙的反思小说/180
	第四节 蒋子龙的改革小说/184
	第五节 谌容的荒诞小说/188
	第六节 刘心武的北京市井小说/192
	第七节 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小说/198
	第八节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202
	第九节 何士光的贵州乡土小说/208
	第十节 张洁的女性小说/212
第九章 新时期的诗歌	第一节 新时期诗歌创作发展概述/219
	第二节 艾青等诗人的创作/224
	第三节 舒婷与朦胧诗/229
	第四节 西部诗歌/237



第十章	
新时期的散文	
第一节	新时期散文创作发展概述/242
第二节	巴金的《随想录》/246
第三节	新时期的文艺性散文/252
第四节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258
第十一章	
新时期的戏剧	
第一节	新时期戏剧创作发展概述/271
第二节	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剧作/274
第三节	新时期的探索性剧作/279
第四节	新时期戏剧的困境与艺术探索和革新浪潮/284
第十二章	
当代电影创作	
第一节	十七年的电影/290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电影/296
第三节	新时期的电影/299
结 语	/315
后 记	/319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胜利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正式拉开了它的发展帷幕。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既丰富多彩又令人深思的发展道路,在由古而今的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生动的篇章。

—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具有运动性和丰富性的文学形态。

所谓运动性,是指中国当代文学处于文学发展的前沿地位,始终处在运动、发展和变化之中。目前,中国大陆的纯文学期刊约有400余种,它们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为人们推出成批的文学新作。就长篇小说而言,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以上。据有关专家统计,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以达3000部左右。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人的数字。由此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犹如一个浩瀚的文学海洋,气势汹涌,奔腾向前。在这个文学海洋面前,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甚至来不及翻检与浏览。现在,即使是作了精细分工的专业研究工作者,他们全身心地追踪当代文学的步伐,一年下来也难以穷尽某种体裁的主要作品,而经过粗略的梳理和归纳之后也只能撰写些“巡礼”、“漫评”、“管窥”之类的文章。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运动特征是过去时代的文学所不具备的。从量的角度来看,过去时代的文学已基本“定型”了。它们的总量,除了偶尔还会有些史料被发掘或发现出来之外,一般说来已不会再有增添而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而处于文学前沿位置的中国当代文学却生气勃勃、运动不息。它始终伴随着当今时代的步伐一道前进,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所谓丰富性,是指中国当代文学量不断增长、质不断被刷新的特性。从上述运动性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量不断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也必将会持续下去。因此,它从“量”的方面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人们难以卒读,叹服其多。与此同时,中国当

代文学在发展中由于其内部因素与诸多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与影响,它的许多理论和创作等方面的问题会不断地被加以重新评价和认识,不断地被刷新和超越。这又从“质”的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同样一个理论或创作上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会产生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对20世纪50年代那批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的评价就是如此。当初,这些作品问世时,受到各界的好评和推崇,不少篇章还被选入大学或中学课本。“文革”期间,这些作品大多被视为大“毒草”,遭到错误的批判和肆意的否定。新时期开始以后,这批作品在拨乱反正中得以平反,被重新加以认识和肯定。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重写文学史”的声浪中,这些作品又从另一角度被“重新认识”,甚至有的论者直接把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创作概括为“赵树理现象”、“柳青现象”而加以否定。而后我们又注意到,有的论者又对这种“重写”中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要对这批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再次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要还其以本来面目。同样一个问题,如此反反复复、是是非非、风风雨雨,还不足以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质”的丰富性吗?除此以外,像对待杨朔等人的散文、郭小川等人的诗歌等创作现象,也都发生过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情况。

了解和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运动性和丰富性的形态特征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给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提出了严肃而重要的课题。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去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运动的发展实践,运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评价和鉴赏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从分析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文学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反对阿谀奉承。恩格斯当年在谈到亚历山大·荣克及其所著《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时就曾批评过他的反科学的文学批评之风。恩格斯指出:“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①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评价古今一切文学作品。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恩格斯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②马克思主义的这

^①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些关于文学研究的科学思想方法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次,必须具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在以往的文学研究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些盲目顺从、随波逐流、口是心非和人云亦云等种种不良风气,正是因为不少人缺少这种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今天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确立和张扬主体意识,充分展现自我的审美创作能力和审美艺术个性,坚守并发挥自我的人格力量,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研究活动与艺术的本性和规律相吻合,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

二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逐步完善的新型学科。

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起步是比较晚的。1976年以后,它才逐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门新型的年轻学科。应当承认,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处在正常、健康的发展过程之中,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由于它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不受到诸多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我们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发生“右”的苗头、尤其是多次出现的“左”的思潮,都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造成过危害。因此,防止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文学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创作方面的具体问题,以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仍然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一学科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从宏观角度看,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诸如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文学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的有关问题,作家群体与创作潮流的问题,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发展轨迹等问题,都是值得而且应当进行深入研究的。从微观角度来看,那些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概括和研究工作也是相当繁重和艰巨的。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由此也产生过许多是非恩怨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理论问题。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这种观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对解放区的文学运动乃至20世纪40年代





的现代文学运动都发生过某种积极的影响。进入社会主义当代文艺运动时期以后,这一命题却逐步地被演绎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甚至在某些极端化的时期还被强调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曲解,文艺被视为政治的附庸,文艺创作的自身规律被忽视和淡化,文艺的审美作用也就只字不提了。这样一来,有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文艺创作,一个阶段的政治便成为广大作家必须要环绕并为之效力的中心目标。长此以往,文艺创作就被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短期行为。很明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建国后相当长的当代文学运动发展中所起的消极和阻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在其发展中难以出现走向世界的大作家、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这一口号的存在与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放弃了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明显缺陷的口号,而改提“二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表述,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在新时期党对文艺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调整,也标志着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正在走向成熟。因为新的“二为”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当然,在新的“二为”提出后不久,有些同志便产生了某种模糊认识,认为文艺从此以后便可以与政治脱离关系了;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也确实出现过一些不良的苗头。对这些同志来说,过去时代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给他们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对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片面认识以及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我们又不能不表示担心和警惕。对此,邓小平曾及时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①。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发展实践表明,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科学的、准确的。事实上,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文艺与政治也是不能脱离关系的。只不过由于诸如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和审美的多种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上的差异,其表现形态有或明显或晦暗、或浓烈或淡化等差别而已。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家也认为:“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或应该是宣传家,或者说:所有诚恳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有充当宣传家的道德义务。”^①对于那些标榜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卢那察尔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作家，你即便用放大镜观察他们的作品，乍见之下也发现不出什么政治来，而实际上连他们都是政治家。有时他们本人也清清楚楚地认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必须用无聊的东西、形形色色的糟粕和荒唐可笑的游戏供读者消遣，这正是为了吸引读者脱离严肃的政治，使他们不致提出生活本身推动他们去思索的严肃问题”^②。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诸如移民小说、越战小说、宗教题材小说、黑人问题小说等，无一不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风云。罗兰·巴尔特虽倡导“零度写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写作……一种政治式写作的历史就构成了社会现象学的最重要部分”^③。这样，我们可以说，“二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认识逻辑和文艺规律的全新的概括和表述，而丝毫不意味着取消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此，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理论工作者都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几十年来我国文艺界也有过争论和分歧，实践中也产生过诸多经验和教训。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强调作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深入生活，尽可能地占有生活材料。这既涉及了文艺创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当时从大城市跑到延安来的某些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提高”的一种批评。建国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加以强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同志却对毛泽东的这一论点作了过于偏狭的理解，甚至片面地认为只要占有了生活材料就能搞好创作，而忽视了作家必须具备的其他方面的素质和技能，尤其是思想与艺术修养等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严重失误。正是在这种偏狭和片面理论的误导下，我国当代文学中的不少作家仅凭其所占有的生活材料来开展创作，显示特色。其结果往往是处女作一炮打响，再往后发展则渐趋疲乏无力，待其材料武库耗尽，则只有靠炒冷饭、重复自己来维持“生计”。对于这种“生活型”的作家，刘少奇认为是“土作家”。他说：“我们许多作家，是革命培养出来的，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群众也有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苏]卢那察尔斯基：《作家与政治家》，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③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

联系,就是知识不够,是‘土作家’,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一点东西,不知道世界知识。”^①刘少奇强调作家不仅要占有生活,而且要注意加强思想艺术的修养,要懂得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等。他还称赞鲁迅具有丰富的知识,认为我们今天的作家要成为大作家,就应该学习鲁迅。我们说,刘少奇的这些论述正是在我国当代文艺运动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源泉”论的观点。今天,我们仍然强调要坚持毛泽东的“源泉”论,强调占有生活对文学创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同时又要着重指出,必须扩大和丰富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正视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尤其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理性精神和审美能力在其创作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实上,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出色的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获得成功,他能否取得突出的创作成就,并非仅仅取决于他占有生活材料的多少;在这方面,深厚的哲学和文学素养,能动的审美意识和按照民族的、历史的、美学的需要所形成的理性精神,以及一定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良好的生活与艺术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鲁迅没有佣工的经历,却成功塑造了祥林嫂这样精湛的艺术典型;茅盾也没有资本家公馆的生活体验,却写出了表现民族资本家生活的经典巨著;同样,卡夫卡没有到过美国,却推出了反映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夏多布里昂的经历也与美洲无缘,然而在他的笔下密西西比河两岸和美洲荒原却被描摹得惟妙惟肖……考察一下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形,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大都具有学者化作家的个性气质:既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又思想深邃,高屋建瓴,洞察世事,体悟人生,具有突出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力。他们绝非仅仅依凭对一定生活材料的占有来反映生活,而是以其思想和学识来表现生活,揭示丰富生动的社会人生图景的。对于这样一种创作情态,有的论者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如下结论:“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生活。”^②(注:着重号为原有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深刻而又科学的结论。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当代文学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由于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已经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看法。这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走向世界的文学大家。相反,那些刚在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却又很快走下坡路、甚至无形之中自己糟蹋自己的作家却大有人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缺少驾驭生活的宏大气魄,缺少学者化作家的理性精神和艺术创

① 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造气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说,就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言,在继续强调作家应该深入生活、大量占有生活材料的同时,又要摒除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偏狭理解,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是当前许多作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待逐步完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出版了许多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其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阶段文学史、文体发展史以及各种容量不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也可谓琳琅满目。全国各地的有关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刊物也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方面还亟待加强与完善。这主要是: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强调指出,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都应该认真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们的思想如果得不到进一步的解放,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便无法得以彻底认识,就会影响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二要大力培养和壮大研究队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林林总总,当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研究者队伍却零零落落、很不整齐。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与读者和社会交流。这种情况的存在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大力培养和扶持新人,迅速壮大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队伍,是加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三要进一步做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我们注意到,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出版的。此后这一工作逐步舒缓乃至停顿下来。现在,由于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出版这些丛书愈加困难。然而,资料工作又是一个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它往往影响到这一学科的发展与成败。因此,我们期待有关方面对此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付诸切实的努力,做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准。

三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也是学习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总的情况来看,目前在理论界和当代文学教学中并存着“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等多种划分方法。我们注意到,各种划分方法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也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视角与特色。

“二分法”似乎是后起的而且是颇有新意的一种划分方法。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二分法”又有两种情形：一种以《中国当代文学扫描》为代表^①，它把中国当代文学分为“建国二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个时期，并认为“建国二十七年文学尚可分为建国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十年文学，但从文学本体看，‘文革’十年文学是建国十七年文学发展的极端，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不再将它划开”；另一种以《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为代表^②，它把中国当代文学分为“1949—1978 现实主义一元化的文学”和“1979—1989 多元美学形态的新时期文学”两个时期。“二分法”强调“以文学自身的变化为依据”来划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期，尤其注意到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十年文学之间的某种质的联系，强化了对新时期多元美学形态的文学的认识，简洁明了。这是其长处所在。

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较为流行的是“三分法”。这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为代表^③。它把中国当代文学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十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三个时期。由于该书出版较早，因而在当代文学教学中有较大的影响。

严格说来，“四分法”与“三分法”没有多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将“十七年文学”再分为“开拓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1949—1956)”和“在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学(1957—1965)”两个阶段。这以《中国当代文学史》^④和《中国当代文学》^⑤为代表。

新时期以来，许多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都认为，划分文学的历史分期不应以同时期的社会历史的分期为标准，更不能以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的分期来取代文学历史的分期，而主要的应以文学自身发展运动为依据来科学、准确地划分文学历史的分期。对此，我们是十分赞同的。问题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当代文学与其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尤其是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年代，“左”倾教条主义文艺思想很有市场，终使当时的文学丧失了主体精神、丢却了自身规律，一度曾盲目地跟随在政治后面野跑，成为那个时期政治的附属品。这样一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文学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几乎是完全重合和等同起来了。只是到了新时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① 陈涛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扫描》，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金汉、冯云青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册 1980 年 12 月，下册 1981 年 7 月。

④ 《中国当代文学史》(全书共 3 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全书共 3 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文学才逐步显示出了自身发展的活力,文学的特性逐步复归,文学的自身规律受到了重视和加强,文学的主体精神和审美功能最终才回到文学之中。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以上几种划分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三分法”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代文学在我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运动变化情况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我们主张用“三分法”来划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时期。其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时期,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到1966年,即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当代文学在开拓中发展前进,也经历了种种曲折。此间虽然遇到了“左”的和右的干扰,但正确路线占了主导地位。总体说来,十七年文学取得了较大成绩,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主要情况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日益强化;社会主义的时代主人和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系列化;各种体裁的文学在曲折中发展前进;主要来自“左”方面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批判运动给文艺界造成了冲击和伤害。

第二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10月,即“文革”十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出现了空前的大倒退。此间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路线占了上风,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具体说来,其主要情况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阴谋文艺”霸据着文坛;一些作品受到“三突出”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呈现着公式化、雷同化和脸谱化的倾向;“文革”后期一些作家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顶住压力,写出了一批好的或较好的作品;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代表着人民的意愿,表现了新的战斗主题。

第三时期,从1976年10月到现在,即新时期文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逐步恢复,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迅速走向高潮,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具体说来,其主要情况是:文学环境宽松、和谐,作家、理论家有较多的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文坛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全新观念的确立,标志着当代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双百”方针被重新强调并得以真正贯彻,推动了新时期各类体裁的文学全面发展,文学创作走向高潮并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文学本体特征得以复归,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张扬;文艺思想斗争处在比较正常、健康的发展过程之中,有“左”反“左”,遇右反右,实行“三不主义”,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习方法也是学习中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在现阶段则侧重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为人民服务 and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体现着各民族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那么,我们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就必须从这一具体的和特定的情境出发,必须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的规定和要求出发。如果偏离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难以全面、深刻地把握和学好中国当代文学。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就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全面的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在坚持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还大力提倡运用能体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人类社会思想方法结晶的新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反映人类思维和科学发展进步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等,不应该回避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方法以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也不应该回避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人本主义等。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化、东西方文化进行充分交流甚至是发生剧烈碰撞的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求实的精神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新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充分做好鉴别、消化和吸收工作,以充实、丰富和壮大自己。

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在学习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贯彻“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时期发展和繁荣文艺的根本方针,两者在质的规定性上是统一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一方面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把“双百”方针搁置起来而表现出某种“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大力贯彻“双百”方针的时候又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所怀疑而呈现出某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